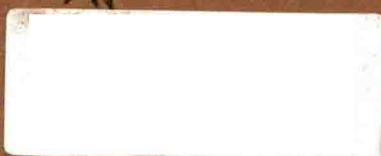


五三六年

文化建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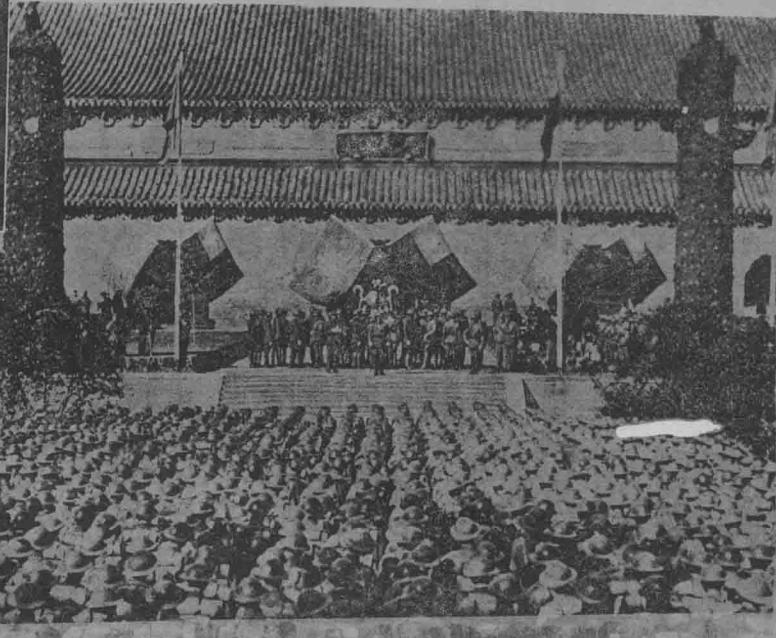
第三卷三四期



六中全會與五全會大全



五全大會開會期中之國民革命軍陣亡
將士墓公祭典禮
在六中全會中遭刺客狙擊幸免於難之
汪院長



六中全會全體委員闢陵攝影

蟄居泰山之馮玉祥氏亦抵京參加六中全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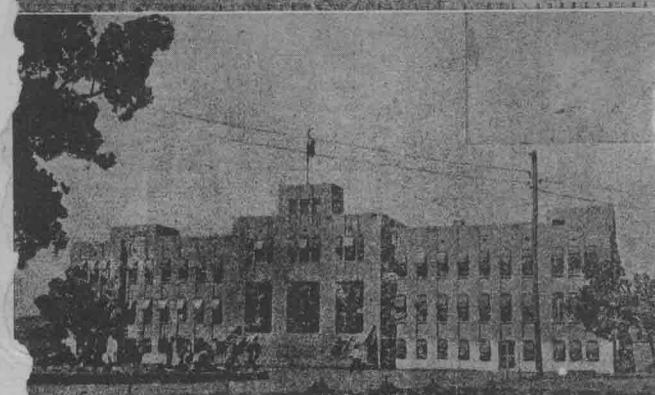
五全大會於十一月十二日在總理陵園舉行開幕

閻錫山氏南下出席六中全會抵京時一瞥



日最近

建凱記



◎ 湖漢鐵路株段，不久可通車，圖為該路中心之衡州車站，已於最近落成

◎ 建築中之廣東深河鐵橋



◎ 上海市博物館

◎ 上海市圖書館



◎ 無錫省立教育
學院新建圖書
館模型
◎ 湖北省立圖書
館



新建之上海麻瘋療養院

廣州孫逸仙紀念醫學院奠基禮



勞動服務運動

首都新運會全市勞動服務團舉行宣誓典禮

湖北省實行人民服務公役

文化界



3 中蘇文化協會正會長孫科
國聯世界文化合作委員會時留影
伯特麥里(1)法前內閣
(3)我國代表

4 歐年秋在日內瓦開會，圖為會
副會長鮑格洛夫
(2)會長牛津大學教授基
光
(1)我國代表李四光

中蘇文化協會成立大會

張餘劇人公演果戈理名作
“欽差大臣”之一幕



金山飾假
欽差大臣
赫列斯達
奇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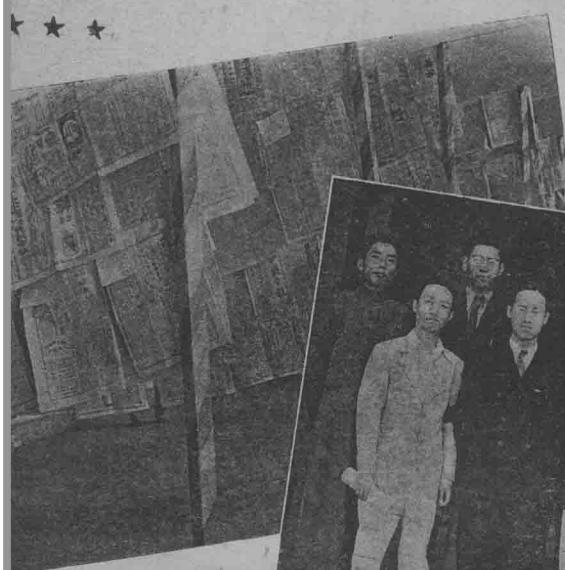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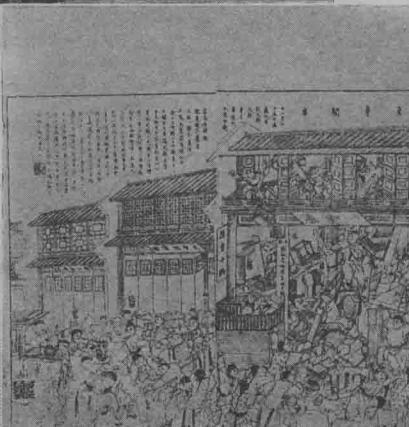
主角，飾縣
長安唐之頤
「欽差大臣」
而已



復大新聞系系聞新界報紙覽



華僑報紙展覽室之一角



點石齋畫報為我國最早
之圖書新聞，係英人美
查氏所創辦



由報刊有記，一
八七二年出版，
距今已六十三年

菲律賓自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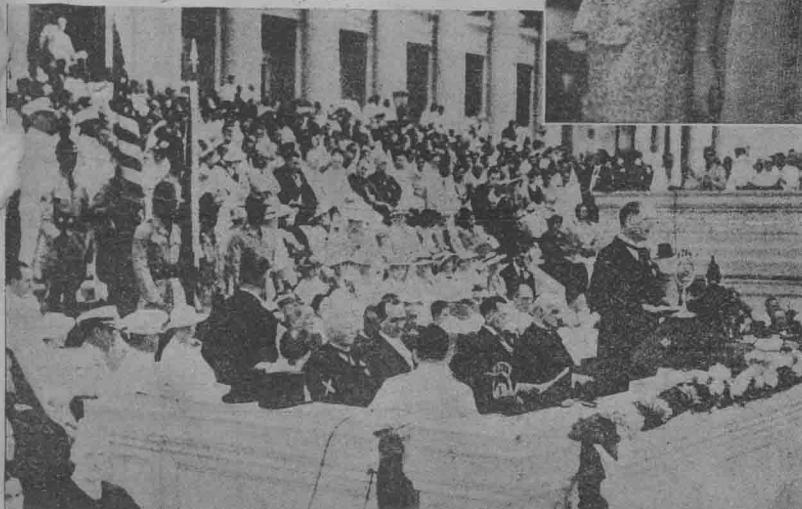


■ 菲律賓首任總統奎松就演說時

◆ 菲律賓首任副總統奧士那敏

■ 美陸軍部長鄧恩代表美總統羅斯福致祝辭，後排有X號者為美副總統迦納

(上右角) 菲律賓自治政府成立典禮之盛
大場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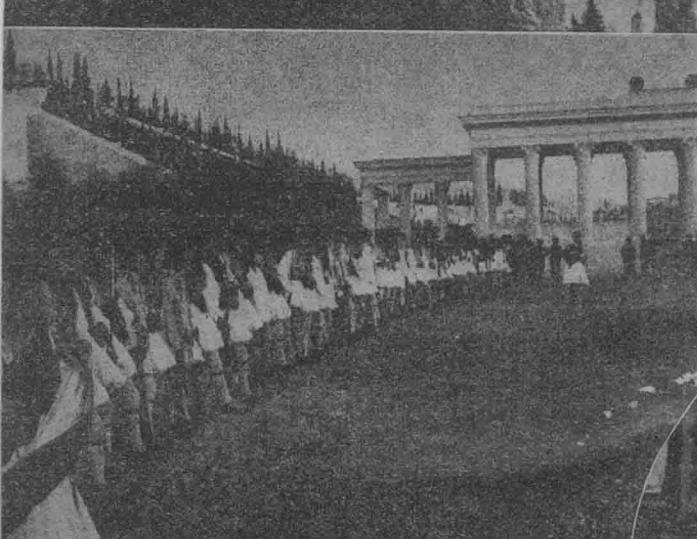


■ 奎松及其家庭

■ 菲律賓的新國旗

希臘復辟

希臘復辟，為世界文明古
城之一，雅典衛城(Acropolis)
(外城)之風景。



希臘陸軍在廣場中等候陸軍
部長作復辟演說

被迫辭職之希臘總統亞米斯

主張復辟之希臘陸軍部長貢
第利斯及其屬員



國聯的掙扎



國聯對意制裁會議之緊張場面



俄代表李維諾夫為弱小民族呼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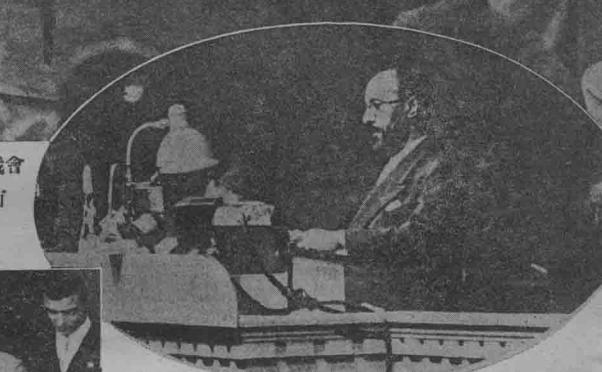


意代表阿洛錫在阿代表發激昂演說時離開會場



主張制裁最力之英代表艾登演說時神情

反對制威之奧代表瑟弗魯
阿代表阿華德痛詆意國暴行
制唯不欲採之過急



法代表賴伐爾聲明法國決以全力維護集體安全





精神建設與物質建設

孟異

在去年十一月號本刊「文化月旦」中記著當初在漢口會說過這樣的話：『由外債之頑固，我國的農工勞動更艱鉅了，而且自來以為不難，我國現為其全數並有兩成銀行恐慌的危險；結果所至，實有不堪設想者。我們到底有無方法可以解救這個困難呢？當民國二十三年之垂垂將盡，記者深感危機的嚴重，殊覺來日之大難，惟在此時，以勸共軍事之告一段落，建設事業，至少在江南方面，可以放手進行，使人對於明年，懷抱一種希望。希望全國上下認定經濟的危機，從此堅決地努力國民經濟的建設。』

現在又是一年完畢，回想去年此時，記者不禁百感交集。在今年一年中，我們是依然放我，毫無成就，並且強敵之侵陵有加無已，國內又遇到了非常巨大的水災。銀行恐慌的危機，雖以通貨管理令之實施而得渡過，但我們須知通貨之管理，不難於對內而難於對外，自今以後，將以何種手段維持對外，確免使不致下落，實為一大問題。而此問題，又關係外交。倘若對外關係不能臻於圓滿，則以野心國家之陰謀搗亂，我國的金融前途，至堪憂慮。所以當民國二十五年的到來，記者感覺到我們現在遭遇了非常的危機，即雖欲從事經濟的建設，而事勢急迫，已為時間所不許了。

但是，雖在此緊急關頭，因為經濟建設關係國家的根本大計，我們是即無此餘暇，也不能恝置不顧的。並且，為了國家百年之計，我們是更當併力以赴，以求尺寸之功。所以今年蔣委員長關於國民經濟建設方案的通電，實可說是針對此急切的需要而發。而由今年這一年的蹉跎無成，我們殊希望自明年起，不管環境如何險惡，都能像蘇聯五年計劃樣，一步步的咬着牙根苦幹下去。這是一點，記者所欲提出以求國人注意的。

但欲經濟建設的成功，還有一點，我們也須加以注意：那便是精神的建設。而當此貪污淫靡、因循敷衍等等成為社會風氣的時候，若無一種洗心革面的工作，即所謂精神建設運動，那末雖有良好的計劃，經濟建設還是不能成功的。周佛海先生在其近著《精神建設與民族復興的自序》中說：

『民族的地位這樣低落，國家的形勢這樣危險，究竟我們怎樣總能救亡圖存以至於復興呢？這個問題，我想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國民，沒有不時常研究，想求得一個解答，作我們努力的指南的。我自己也就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。政制改革，吏治刷新，農村繁榮，工業振興，財政整理，金融安定，交通發達，軍事建設，教育普及，乃至外交方略，民眾組織，以及一切和民族復興有關的各問題，沒有不大略的或精細的研究過。但是想來想去，終覺得這許多的問題，即使有了辦法，似乎還缺少了一個先決的條件。就是這許多的事業，甚麼「人」去擔負？這許多的任務，甚麼人去完成？於是覺得「人」的問題，乃是一切問題的先決的和根本的問題了。而要解決人的問題，又要先轉移社會風氣和改變時代精神。』

並且，記者以為精神建設的工作，較之物質建設，其艱巨困難，實過之無不及，所謂『去山中賊易，去心中賊難』也。故當民族危機的逼迫，從明年起，我們殊希望一般名流領袖，能為民表率，示人以一種樸實苦幹的精神。至少勿酒食徵逐，鮮車巨廈，專以捧明星，交女伶為事。蓋不僅國奢須示之以儉，且我們須知留個好榜樣與他人，亦即為民族留一分元氣。況當此民窮財盡，國難嚴重之時，我們又

何心以歡娛享樂乎！

北平教育界宣言

高 儒

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，北方的知識分子常恐外患及於故都，珍貴文物被人損壞，於是在一二年前曾有人提議劃北平為文化城，其意以為如此則北平一地可以脫離政治關係，避免戰爭危險，使歷史文物可以永遠保存，而嗜古好學之士亦可以長久安居樂業，從事其研究探討之生活也。此種倡議，雖至今未曾見諸實行，然由此亦可知數年來在國難嚴重之下，所謂知識分子之心理趨向矣。茲者所謂『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』已經出現，而且此種不合法之組織漸有蔓延之勢。今日喪心病狂之輩所鼓動的自治組織，當然與昔年知識分子所提倡的『文化城』有所不同，然其欲脫離國家的政治管轄，則差不多可說是前後如出一轍。我們撫今追昔，不禁要說：今日脫離中央之所謂自治委員會，『其所由來者漸矣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』所以日前申報社論說：

『知識分子多數好為妥協苟安之計，昔年有人提議北平為文化城，最為此說之堅證。而南方人士以為華北危機隱伏，家有子弟，不欲遠往北方學校肄業，亦為此種心理之具體表現。誰知凡此逆來順受之舉，適足以鼓起野心者加緊侵迫之熱望。荷舉國如是，鉄蹄馳驅，知入無人之境矣。』（十一月二十九日申報）

但是『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』，因於心衡於慮而後作，徵於

色發於聲而後喻」此雖爲一般人之常情，而知識分子亦不能有外於此。所以在此華北問題嚴重之時，北平文化教育界領袖二十餘人發表宣言說：『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和組織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的舉動，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力量維持國家的領土及行政的完整。』而北大全體學生亦於十一月廿八日發表宣言，聲明決不南遷或離校，誓以犧牲精神效法國『最後一課』與華北共存亡。時至今日，外患之逼迫已至生死關頭，問題之嚴重亦絕非幾篇宣言可以解決；但是在此生死存亡之際，而知識分子能有最後之覺悟，至剛之精神，發出正氣凜然之呼聲，則無論如何，猶不得不謂中國人心未死之表徵。全國上下苟能將此種精神擴而充之，通力合作，『維持國家的領土及行政的完整』，則中國目前之勝負雖未敢必，要不至如此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任人滅亡而毫無所阻也。胡適之先生於十一月十七日在《大公報》說：『我是當年曾替華北停戰協定辯護的人……現在看來，我完全錯了。塘沽協定成立以來，兩年半之中，我們完全忽略了守禦的工作，所以我們不能禁止別人得寸進尺的野心。』我們讀了胡先生這段誠懇懺悔的話，覺着不僅胡先生應當覺悟當年替華北停戰協定辯護的人完全錯了，當年主持華北停戰協定的人更應當覺悟是完全錯了，今日如有人再欲學以前的辦法而作類似或有甚於華北停戰協定之事，那便是千錯萬錯，必致日後雖欲覺悟而不可得也！

言，聲明決不南遷或離校，誓以犧牲精神效法國『最後一課』與華北共存亡。時至今日，外患之逼迫已至生死關頭，問題之嚴重亦絕非幾篇宣言可以解決；但是在此生死存亡之際，而知識分子能有最後之覺悟，至剛之精神，發出正氣凜然之呼聲，則無論如何，猶不得不謂中國人心未死之表徵。全國上下苟能將此種精神擴而充之，通力合作，『維持國家的領土及行政的完整』，則中國目前之勝負雖未敢必，要不至如此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任人滅亡而毫無所阻也。

國家至此，吾人絕不能把救亡圖存之事盡委之於知識分子，然身爲知識分子者亦不應將此種責任完全放棄，故吾人不惟對於北平教育界之宣言表示同情，且希望全國教育文化界都有如此的正義主持，更希望身負國家實際責任之人將此種正義主張有以實現之也。

精 神 的 國 防

平 生

自從東北淪亡，華北便是我們國防的第一線。然自塘沽協定，長城已不足限敵人的馬蹄，再經今年夏間的事變，河北也漸布滿敵人的勢力。於是我們華北的國防，被撤殆盡，敵人乘之，遂欲利用少數漢奸，以建立所謂『自治政府』了。

時勢至此，凡有血氣，誰不痛心？而記者以爲最令人太息無已者，是所謂漢奸之人，儘多知識分子，如殷汝耕者，向以『日本通』著稱，而今則即爲『通××之人』，所謂知識，適足以濟其爲惡之技。我們回顧過去的歷史，清之入關建國，以洪承疇、吳三桂、蒙古之滅宋也，以張宏範、北宋之亡也，有張邦昌、劉豫。當國家覆亡之時，而所謂士大夫者，竟不惜爲虎作倀，這是國民意識的喪失，民族心理的滅亡，故由殷汝耕的叛變，其意義實很重大，表示我們的精神上，現在是也發生動搖了。蓋殷逆與其他諸人不同，如鄭孝胥者，原爲遺老，又如石友三輩本屬封建軍閥，向爲國人所不齒，而殷則直至

最近，固爲政府官吏，不料他即以政府行政專員的地位，爲賣身投靠的手段，是誠大可慨矣！

然而當此之時，平津危如累卵，帝國主義者正張牙舞爪，逞其淫威，而我北平教育界領袖如蔣夢麟等，竟能不畏強禦，發表反對組織特殊政治機構以分割我中國領土的電文，不能不說是一件使人振奮的事。這表示着雖在藩籬盡撤，門戶洞開的華北，我們尚有一道精神的國防，而尤其當這般逆叛變，漢奸蠢動之時，這種義正辭嚴的聲明，更與人以順逆之辨，邪正之分，我們的精神的國防，蓋即在此時，仍兀然保其堅固的存在！

惟此國防，視之不見，撫之無物，且其基礎之所在，似僅限於少數，不能普遍及於大衆，故由國難的嚴重，我們覺得必須竭力使之增強擴大，乃能抗禦外侮，爲民族復興立不拔之基。因此之故，民衆之喚起與組織，在今日是不可或缺的事。並且，也惟有如此，乃能使精神的國防，具體化爲捍衛國家的真實的力量。使如一盤散沙般的人心，團結成爲堅固的水泥的城壁。

謠言與學校

文 夫

抑記者更有不能已於言者，在這嚴重的時期，不論其爲謠言或事實，居於社會領袖地位的學校機關，他是維繫人心的樞紐，是鎮定社會秩序的中流砥柱。其所負的職責實非常重大。倘若也如一般民衆樣，聞謠言而驚惶失措，則我們又何貴乎有學校？且因青年學生的騷動不安，結果必更爲搗亂好事者所乘，益增謠言的氣勢。是所謂學校者，乃爲助長謠言增加社會不安的機關，國家又何必年費巨款以爲辦理乎？

近一月來，謠諑紛傳，人心惶惶，儼如大難之將至。人民無知，一時爲羣衆心理所支配，致奔避移居，慌亂不可終日，原不足責。而可怪者，學校學生，不知平日所學何事，一聞謠言，亦相驚伯，有庸人自擾。自然，因爲名爲知識分子的學生，尙驚惶如此，於是那些無稽的謠言，遂更如鑿鑿有據，實有其事了。

但是話得說回來，我們須知所謂學生者，多屬青年，他們對於事實的真相，原有待於認識。當此之時，爲之教師者，倘能詳加解釋，固未嘗不足以去其惑，使之鎮定如常，安心向學，且給與社會一般以良好的楷模。這種安定人心，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，倘若學校當局能夠善盡其職責，我以爲其力實勝於政府的皇皇告示多多。然而從這次上海的謠言風潮中，我們的所謂學校教師，尤其是一般大學教授，却充分表示其無常識與無修養。他們一聽到謠言，便紛紛移居，遷避惟恐不及。爲人表率的教師尙如此，我們又怎能以責一般青年學生呢？

職業，作官的階梯。因為不是辦教育，所以沒有服務觀念，沒有犧牲精神。因為這只是一種生活的手段，所以若有事變將與其生活發生不利，便走避惟恐不及。而在平時，則為保持此生活的手段，遂一切卑鄙無恥的行動，都所不惜；總之，充滿在這種官僚教育家心中的，只是一種患得患失的觀念，一種陞官發財的精神，如是而已。

因為如此，所以無稽的謠言，在這種教育家反可視為一種手段以消滅學生不滿學校的心理，要利用謠言以為鎮壓。故其教職員之居於學校附近者，不僅率先走避租界，且當政府告示闢謠，學生要求學校當局住校中以安定人心之際，而為之校長教務長及院長主任者，卒無一人敢挺身以出平心而論，此種無常識之輩，恐懼謠言，深怕一旦發生事變，致受犧牲，故教育家的職責應該如何，可以不問；而還有一半的原因，還是因為恐懼學生，深恐不利於己。蓋在平日，既全恃武裝警察以維持學校秩序，沒有保鏽不敢單身獨行，當此緊急關頭，自更胆小若鼠，莫名其妙。

所以像復旦大學當局之因謠言愈傳愈甚，學生相率走避，為安定人心計，竟毅然決然住居學校，其勇氣與卓識是值得我們的欽佩的。但是我們須知復旦為私立大學，學校存亡，個人利益所關，故尚能保有一種為事業而犧牲的辦學精神。至如不然，學校國立，其辦學也，乃為朋分經費而來，自沒有為學校而犧牲一己的必要了。但是這樣的辦學，其無補於民族復興，不且只有促進民族的墮

落，我們從這次謠言的試驗，却得到了明白的認識。而若以之視北方的教育界，雖在帝國主義淫威之下，仍能勇敢地對於所謂「自治運動」表示反對者，其質不肖的相去，誠哉是不可以道里計了！

言論的統制與壓制

一 羽

近頃以來，由國難的日趨嚴重，大家都感到一樁最可痛心的事，是民氣的消沈。今年國慶節，汪院長特寫了一篇短文，發表於各報，題目叫作『消沈與沈着』。他希望國人能以沈着來代替消沈。他說：『沈着與消沈之不同，不但須存之於決心，而且須見之於行動。』但是他又說到『浮囂的現象是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好大言，無實際，而消沈的現象是自信力消失，惟知以偷生苟活為事』。然而一般人何以『自信力消失，惟知以偷生苟活為事』呢？我以為這原因自然很多，但最大的是政府新聞政策的錯誤，把言論的統制認為壓制。

時至今日，自由主義之時代落伍，我們已可不必再論。且世界亦決無絕對的自由，所謂自由者，蓋如經濟上的『界限効用說』，有其一定的限界，不過因時代與環境之不同，限界之廣狹大小有所差異而已。故當此民族以受壓迫而要求解放之時，凡與民族主義有背的言論，不得隨意散布，實為一種統制言論政策，而决不是壓制。蓋統制者，其目的在使國論趨於一致，即凡無背於民族主義

的言論，都在可以自由發表之列。這與壓制的意義實大不相同。

然而現在的新聞檢查政策是何呢？一方面由於外交上的顧忌，他方面由於檢查者之無常識，遂使報章雜誌，幾於成了『沒字碑』。

中央日報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社評說得好：

『就如這一次殷汝耕的叛變，前幾天天津的暴動，報紙至今有沒有詳細的記載報告人民？即如前天津暴動的亂民，在暴動中間被民衆圍毆的事實，外國通訊社都登出來了，為什麼我們的報紙沒有？殷汝耕叛變後，政府外交上的抗議，政府議決了，外國通訊社也已經發表了，為什麼不准本國報紙登載？再進一步講，現在所謂華北的局面，究竟是什麼一個葫蘆？政府的應付是另一個問題，然而葫蘆是什麼東西，總應該給人民充分知道。』

因為是在這種新聞檢查制度之下，於是如該報社評所言：

『我們公私的報紙告訴我們人民的是連篇累牘的『樂觀』『圓滿』。政府要人的談話表示，是告訴我們平安鎮靜。報紙上告訴人民的現狀是天下太平。人民對於這種現象，自然是各謀營生，有甚麼功夫來管誰當選中央委員，誰落選中央委員，誰要做部長，誰要做院長。人民真心上所注意的，只是國家的安危，所冷淡的，全是個人的升沈進退。這幾年來，報紙上告訴人民的，有多小關於國家安危的記載？這幾年來，有沒有把一件嚴重的關係國家安危事件，原原本本詳細告訴過國民？』

結果所至，遂如中央日報社評之所痛言：

『河北省二十二縣的領土，被叛逆佔據了三天，國有鐵路幾條幹線的交點

豐台車站，被日本軍隊佔領了二十四小時以上，政府對付事變的處置，到現在止，只是一個對殷汝耕的免職拿辦命令，社會對付這件事的表示，只是昨天上海工商會、市總工會、地方協會及中等學校協進會各自一個通電。政府的措置，自有各種的籌備及考慮，我們應當信任，暫時不必加以批評；可是中國國境內的領土發生這種重大的搖動，而人民方面的表示，冷落到如此，這個意義的嚴重，比二十二縣領土的得失，不可同日而語。政府對付危局的轉手，實在再沒有比這個現象的難辦。換句話說，政府應付國難，無兵，無械，無餉，都還算不是無辦法；獨至大局已到土崩瓦解，而人民尚未有感覺，時勢已到國家人民同歸於盡的時候，而人民尙仍以為這是另有負責的人，自己不必過問，那才真真是無辦法。』

所以爲今之計，對於這種專以壓制封鎖爲事的新聞檢查制度，我們覺得實有根本革除的必要。關於這一點，中央日報的主張是：

『時局嚴重到今天，我們想到的初步根本補救辦法，是政府趕快改變新聞政策。黨部或政府主管新聞的機關，趕快應該與言論界商量一個簡明的辦法，明白規定幾條嚴格的限制外，凡是關於危害國家的陰謀舉動及人物，毒害政治或觸犯之各種事實及行爲，人民愛國行爲之表示及舉動，尤其外國報紙的各種批評及確爲事實的紀載，應該一律准許本國的報紙登載。這種條文詳細的擬定及流弊之防止，當然要經過相當時日的考慮，但是條文愈簡單愈好，愈明白愈好。惟記者之意，覺得爲使黨的主義及政府的宣傳政策貫澈於全國的報紙，除規定報紙不得逾登載的範圍外，各級黨部負責宣傳的人員，最好更能與當地新聞記者時時發生關係，藉以交換彼此的意見，傳達中央的意旨。但對於報紙的言論或記載，除違反法令須

由法定機關辦理外，當任其享有相當的自由，不能加以干涉。蓋一經干涉，就難免無理的壓制。總之，言論的統制，在與人以共同遵循之路，決不能一味壓制，使人絕耳塞聰陷於無知無識也。

幣制改革與貨幣本位

素 民

我從今年一月起，迭在本誌各期，說明我國改革幣制之必要，極力提倡自動的放棄銀本位。即在上月本誌上，曾說：『我們救治的辦法，是要政府明白規定政策，立即實行貶低幣值，安定幣制，以剷除金融緊縮之害。』又說：『希望政府速定辦法，勿再因循。』到了本月三日，財政部頒佈改革幣制的佈告，實行我今年一月間提議的辦法的第一項『將白銀收歸國有，停止各銀行鈔票之兌現』（參看本誌一卷四期怎樣解決幣制問題）。這種改革實行後對於中國經濟的實際效果怎樣，我已另文在本期本誌上論到，在這裏，我要講的，只是我國改革幣制以後，我們的幣制是否還是銀本位一問題。

白銀國有和鈔票停止兌現的辦法，年來頗為一般『健全通貨』論者所反對。最奇怪的是：他們現在對於新幣制，多發表意見，表示贊成。不過他們在贊成之中，却有一個極妙的議論，即是堅持新幣制雖停止現金的使用，然未脫離銀本位。這樣一來，他們似乎只讓一步，沒有讓兩步。因為他們以前是反對停止現金的使用和反對銀本位放棄。現在他們對於停止現金的使用一層，是讓步

了，可是對於銀本位的放棄一層，還不甘讓步，硬說新幣制還是站在銀本位上。這裏就發生一個學理上的大問題，即究竟什麼是貨幣本位？什麼是銀本位？

貨幣本位，即是價值的本位；詳晰說來，即是『用以衡量一切貨物的價值』之一定數量物品之價值。至少，凡金屬貨幣本位的意義是這樣的（在管理通貨，那衡量一切貨物的價值之紙幣價值是受着人爲的管理或操縱的）。例如美國舊金本位，是二三・二二喱（grains）的黃金（即一金元所含的純金），一磅黃金重四八〇喱，等於二〇・六七金元，故一金元約爲一磅黃金二十分之一。這一磅斯的二十分之一的黃金價值，即是美國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以前的貨幣本位。在這裏，我們要注意的，即一金元的價值，必與其所含的純金的市價相等。所以二者可自由交換，可自由輸出入。同樣，依我國銀本位幣鑄造條例，每一銀元必含純銀，我國舊有的貨幣本位，一元銀幣與二十三個多公分的純銀的市價相等，二者可自由交換，可自由輸出入。這即是銀本位。從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國徵收白銀出口稅和平衡稅以後，至新幣制實施之時，國內銀幣價值，較海外銀價，平均約低百分之二十五，一元銀幣只值其所含純銀的世界市價之七成半，而同時，現銀的輸出，已不自由。所以在這時期中，我們雖行使銀幣，然實際上已放棄了銀本

位；何以故？幣價已脫離世界銀價。故到新幣制實施時，平衡稅由百分之六・七五加到百分之五七・二五；匯價安定在一先令二便士半上；於是一元銀幣只值其所含純銀的世界市價之六成。財部佈告上第六項明白規定國幣對外匯價，按照『目前價格』穩定（即當時對英約為一先令二便士半，對美約為二十九元七角半美金，對日約為一百零三日金）是政府明令壓低幣價四成（依金法郎所含的純金減為戰前的金法郎之五分之一（舊法郎與英鎊的平價為二五・二二法郎合一鎊）同時，恢復金銀的自由輸出，鈔票通常雖不發現，然在一定額之上，可以兌換金塊。紙法郎的價值，與法定金法郎所含的純金的價值相當，可以在牠對英的匯價（指在英國放棄金本位之前）上看出來。所以戰後英法的金本位制，可以稱為金塊本位制。但中國今日的新幣制，既無紙幣兌換銀塊的法價之規定，而紙幣的價值又不與銀幣所含純銀的價值相當，現銀更不能自由輸出；則新幣制是脫離了銀本位，毫無疑義。

這個理論問題，在學術上和事實上，都關重要。我以為放棄銀本位，并不是一件醜事，用不着諱莫如深。否則指鹿為馬，在學者失掉忠實的態度；在政府，失掉堂堂正正的態度。更進一層說，銀本位制并不是一種高尚的貨幣制度，乃是一種落伍的貨幣制度，只有阿比西尼亞和我國等經濟落後的國家保持着。今我國棄之，有何可惜？新幣制是一種管理通貨，管理通貨乃是世界上一種進步的貨幣制度，我們今日能採用之，乃是我們的榮幸。堅持銀本位論者，正和女人放足一樣，纏足本是野蠻習慣，一旦放足，仍自謂足小，諱言足大，徒足證明其思想之落伍罷了。

然而論者說：歐戰後歐洲各國恢復的金本位制，如英如法，并不行使金幣，仍不失為金本位，則我國今日的停止現金的行使，也不失為銀本位。不知金屬本位的要義，在於幣價與其所含的純金屬之市價相合和此二者之自由移動。英國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一九三一年間所採之金本位制，凡人民要輸出黃金的，可依三鎊十

七先令十便士半一翁斯的價格，向英倫銀行購買金塊，輸出國外；同時，紙鎊的價值，仍與金鎊所含的純金價值相當，可以在牠對美國的匯價上看出來。法國自一九二八年六月恢復金本位，將金法郎所含的純金減為戰前的金法郎之五分之一（舊法郎與英鎊的平價為二五・二二法郎合一鎊）同時，恢復金銀的自由輸出，鈔票通常雖不發現，然在一定額之上，可以兌換金塊。紙法郎的價值，與法定金法郎所含的純金的價值相當，可以在牠對英的匯價（指在英國放棄金本位之前）上看出來。所以戰後英法的金本位制，可以稱為金塊本位制。但中國今日的新幣制，既無紙幣兌換銀塊的法價之規定，而紙幣的價值又不與銀幣所含純銀的價值相當，現銀更不能自由輸出；則新幣制是脫離了銀本位，毫無疑義。